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精品工程项目

经济伦理研究

王锐生 程广云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精品工程项目

王锐生 程广云 著

JINGJI LUNLI YANJIU

经济伦理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伦理研究/王锐生 程广云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10

ISBN 7-81064-089-5

I. 经… II. 王… III. 道德-关系-经济 IV. B8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3113 号

JINGJI LUNLI YANJIU

经济伦理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首师大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25

字数 203 千 印数 0,001~1,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前 言

在 80 年代中期，当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之路时，我就从哲学角度关心经济——伦理方面的问题，写过一本《商品生产与精神文明》的小册子（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生活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越来越吸引我的注意力。于是前些年向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申请一个经济伦理研究的项目，并且得到批准、资助。这本书稿就是该研究项目的成果。

经济伦理是两门学科的交叉。经验表明，在学科交叉之处常是新问题的生长点。但因为它是两个领域的结合部，所以经济学家因它不是专业经济学问题而觉得肤浅；而在伦理学家看来，它只能归属到应用伦理学的范围。我认为，只要是现实中值得关注的问题（许多经济伦理问题已成为社会上关注的热点，如效率与公平关系、经济生活中的拜金主义等），就要考察和分析。本书全部章节所涉及到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这一类现实生活问题。因为不是写教材，所以无须搞一个关于经济伦理的完整理论体系，烦琐地讨论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等。这些留待擅长写教科书的人去搞吧。

经济伦理这个研究对象，由经济学家去讲，是一番内容，与伦理学家讲的可能不大一样。而伦理学家讲的经济伦理，也可能同一个哲学家讲的不完全相同。正因为我主要是以哲学为专业的，所以讲的内容就偏重在宏观方面，而微观方面——如企业伦理、商业伦理一类就欠缺了。一本书的研究对象如果过于宽泛的话，要求它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这大概是哲学工作者讲经济伦理的局限吧。但正因为我是从哲学视角谈经济伦理，所以宏观到把全球一体化中的经济伦理问题也囊括进来了。

这本书，除了第一、二章谈论经济伦理研究的一般性问题和经

济与伦理关系的历史考察外,其余各章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关于经济全球化中的经济伦理问题;一部分主要是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经济伦理问题。这两部分的问题涉及面广,论述范围从亚洲经济危机到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市场经济的人性假设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从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到社会转型期的道德价值观变动;从经济生活中的公正、公平到契约道德;直至中国传统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问题涉及面虽广,但贯穿其中的始终是对经济伦理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概括起来说,本书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为背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解剖刀”,对经济伦理领域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作出尽可能深层次的理性分析。

由于本人专业知识所限(我既非专业经济学家,又非专业伦理学家),论述中难免有贻笑大方之处,伏希不吝赐教。

王锐生

1999年5月5日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关于经济伦理研究的几个一般性问题·····	(1)
一、经济伦理研究从何而来 ·····	(1)
二、经济伦理研究的学科归属 ·····	(4)
三、经济伦理研究何以可能 ·····	(6)
四、经济与道德的可分与不可分：二者的互斥与 依存 ·····	(10)
第二章 经济与伦理关系之历史考察 ·····	(14)
一、古代——近代——20 世纪 80 年代 ·····	(14)
二、西方经济学关于“道德人”——“经济人” ——“社会人”的思想演变轨迹 ·····	(19)
第三章 经济全球化并非一起浮沉 ·····	(31)
一、全球化的概念 ·····	(32)
二、经济全球化的成因 ·····	(33)
三、经济的全球化绝非全球共浮沉 ·····	(36)
四、几点概括 ·····	(42)
第四章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民族意识的矛盾 ·····	(44)
一、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因素 ·····	(44)
二、西方的论点 ·····	(46)
三、对西方论点的辨析 ·····	(49)
四、经济全球化与爱国主义并行不悖 ·····	(56)
第五章 东亚经济危机与亚洲价值观 ·····	(59)
一、东亚奇迹 ·····	(59)

二、东亚奇迹并非主要来自亚洲价值	(61)
三、因金融风暴而完全否定亚洲价值也是错的	(64)
四、亚洲价值的重新评价	(69)
第六章 经济人与改革	(77)
一、引言	(77)
二、一篇批判改革的“经济人导向”的文章	(78)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市场经济的批判	(79)
四、对比：学风问题	(82)
五、假如“产品社会主义”不存在.....	(84)
第七章 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	(90)
一、两种经济人的异同	(90)
二、经济过程各个环节上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 相互关联	(93)
三、附：关于“斯密问题”	(100)
第八章 市场、人性与道德	(105)
一、斯密的“经济人”——市场经济的人性假设	(105)
二、市场经济下的人性与伦理	(109)
三、利益驱动与伦理状况	(112)
第九章 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与伦理价值观的变动 (之一)：经济体制转型在价值观念上的 反映	(122)
一、计划经济体制与价值观	(123)
二、市场经济体制与价值观	(138)
第十章 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与伦理价值观的变动 (之二)：价值观念的种种争议	(157)
一、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道义论和功利论(功利 主义)问题上的种种争论	(157)
二、在批判拜金主义问题上的种种争论	(170)

第十一章	市场经济中的公平问题	(186)
一、怎样才算公平	(186)	
二、市场经济带来的是公平还是不公平	(189)	
三、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192)	
四、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	(198)	
第十二章	经济公正与经济不公正	(203)
一、经济公正的两个层次	(203)	
二、衡量经济公正的尺度	(207)	
三、保证经济模式公正性的可操作具体措施	(210)	
四、经济模式不公正：腐败现象滋生的温床	(214)	
第十三章	契约道德、信任与竞争	(221)
一、经济生活中的契约道德	(221)	
二、信任的界定	(224)	
三、改制中维护正常的社会信用关系	(227)	
四、竞争与信用的辩证关系	(229)	
第十四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234)
一、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	(235)	
二、体现在中国古代“活文化”中的环保思想	(236)	
三、从环保视角看儒道各派的天人关系观	(237)	
四、道家的天人合一观最有启迪性	(240)	
五、“天人合一”观在现代化中的地位	(244)	
主要参考文献	(247)	
后 记	(250)	

第一章 关于经济伦理研究的 几个一般性问题

一、经济伦理研究从何而来

经济生活中有伦理道德问题（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伦理道德研究中又常常涉及经济（如何赡养双亲以尽孝道，在今天市场社会里就不能不涉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但这不等于已经有了“经济伦理学”了。

把经济学与伦理学结合在一门学科中（作为交叉学科）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进步。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才兴起的。但在经济伦理学出现之前，对经济伦理的研究，在西方已有很长的历史。

考察一下西欧近代的历史，可以看到，那里的市场经济不仅比东方出现得早，而且有其深厚的文化伦理基础。如果把市场经济看作一种文化伦理现象，那么西方的市场经济比中国成熟得早，不是偶然的。因为西方市场经济的文化伦理基础可以追溯到：（1）古罗马的“罗马法”（它规定了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系统）；（2）基督教教义所阐述的平等学说（一切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3）15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鼓吹的个性自由、人格独立的思想传统；（4）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倡导的禁欲、勤俭、敬业和聚集财富（这种聚集财富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近代观念。

除了上述市场经济的文化伦理基础，就理论研究（学理方面）来说，西方经济伦理学的滥觞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德国的“国民经济学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是：F·李斯特、罗切尔、施默勒和 M·韦伯

等)。他们发展出一种经济科学理论,把经济看作文化,用精神科学、文化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方法去分析经济。对于这些“历史学派”人物来说,经济科学也是历史科学,必须对经济现象作历史、文化和伦理的解释。就是说,经济科学必须成为伦理经济学,并与实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学问)统一在“国民经济学”这个概念之中。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一些经济学家不满意于传统的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的观念,开始把人不仅看作经济人,而且看作社会人、伦理人(道德人)。于是,经济伦理研究就进一步发展起来,成为一门学科:经济伦理学。

在中国,经济伦理研究缺乏西方那些实践的和学理上的准备。在古代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伦理问题长期被禁锢在儒家的政治伦理框架内。就是说,经济生活中的利益要绝对服从于封建性的义理“见利思义”。而且这一类经济生活中的伦理问题,严格地说,与当代的经济伦理研究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所谓“经济伦理”中的“经济”,指的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而在古代东方封建社会里,农业自然经济是封建政治统治的根基,它排挤着商品经济。因为后者以商人、高利贷者的面貌出现,瓦解小农经济使之向两极分化。所以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政策导向都是重本(农)轻末(商)。可见,在中国,不但近代以前缺乏西欧市场经济的文化——伦理基础;在近代以来,更没有类似19世纪德国“国民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学理准备。

作为市场经济与伦理结合的一种理论研究,在当代中国主要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才引起人们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并非偶然,并非出自近20年来对来自西方的种种“理论”的时髦追逐,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这就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具体来说,就是:

第一,市场经济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被正式认可之后,人们起初只是单纯从经济学角度把它看作对社会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一种经济体制。后来,才开始进一步把它看作一种文化现象、一

种文化——伦理的生活方式。这样理解的市场经济，在理论逻辑上必然导致把经济与伦理结合起来。

第二，在经济体制方面引进市场经济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生活的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有人说，这与市场经济有关；有人说，这与市场经济无关。有人说，市场经济带来了道德的“滑坡”；有人说，恰恰相反，市场经济带来的是道德“爬坡”。这些争论且不说孰是孰非，它们本身就促使人们从伦理角度探讨经济，或从经济角度探讨伦理。

第三，市场经济一旦实行，就既带来效率也拉开了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从而产生出社会公平问题。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二者是兼顾关系，还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抑或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总之，效率与公平日益成为理论界与老百姓日常的话题。而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也就是经济伦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四，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业已进到“攻坚”阶段。这时候，与改革的指导（或导向）思想相关的争论也日趋尖锐。其中，一个十分尖锐的争论问题是：用什么来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导向？人们公认，旧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导向是道德人导向；而新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导向是经济人导向。这样，经济伦理研究中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问题必然同经济体制改革总的指导原则（即它的导向）密切相关，成为与经济体制改革出路有关的一个焦点问题。

第五，企业伦理与商业道德问题。经济体制的转轨不单在改革的导向上产生经济伦理的争论（即经济人导向还是道德人导向之争），而且在微观经济领域也日益突出一系列经济伦理问题——例如，企业（合乎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的良性运营需要有企业伦理与企业文化的直接参与。又如，商业活动的健全展开也需要有商业道德与销售文化的介入和引导。不如此，短斤缺两、以劣充好、以假（冒）充真，甚至谋财害命（如以工业酒精大量造有毒的、致人死命的假酒）之类危害社会的现象就会泛滥起来。商业道德、销售

文化是直接关系到千百万群众日常生活的、具有普遍性的经济伦理研究问题。

我们相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伦理研究将获得更大的关注。

起初，本课题组在申报研究项目时，我们的视野只是集中在国内的经济伦理问题上。所以申报的项目名称是：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伦理研究。但1997年夏天爆发的随后蔓延到各大洲的金融（经济）危机使得课题组不得不把视野扩展到全球经济上来。因为实践表明，不仅全球经济与国内经济及其改革无法分开，而且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经济伦理问题也成为世人瞩目的问题。例如，对所谓“亚洲价值”的评价问题，对金融危机中的道德危害和道德风险问题，各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道德责任问题，等等。课题组不打算回避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又把研究视野扩展到这方面来（这也是本课题完成时间略有拖延的原因）。

这样，作为本课题研究直接产物的这本专著就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 第一，关于经济伦理研究的若干一般性理论问题；
- 第二，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历史考察；
- 第三，有关全球经济范围的经济伦理问题；
- 第四，有关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经济伦理问题。

二、经济伦理研究的学科归属

这种研究可以有两种归属：

（1）从经济学角度探讨经济发展中的伦理问题。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所著《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一书的“序”说：“经济学有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分。实证经济学研究‘是或不是’的问题，规范经济学研究‘应该或不应该’的问题。既然涉及了‘应该或不应该’，那么规范经济学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伦理分析的性质。我在

探讨上述这七个问题（指：效率与公平、产权交易、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个人消费行为、个人投资行为、经济增长的代价、合理的增长率——引者）时，采取了规范经济学的方法。”^①可见，经济学家视野中的经济伦理研究属于规范经济学的内容，因为它们涉及到经济学中一些价值判断问题。

（2）从伦理学角度探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道德问题。199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中、德合编的《经济秩序理论和伦理学》（“经济伦理研究”丛书的第一本）。该书的中方主编陈筠泉在撰写的“导论——进一步推动经济伦理的研究和发展”中写道：“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伦理学问题变得十分突出。特别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应用伦理学更具有重要意义。应用伦理学的出现与发展，正是为了解决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各种道德问题。当前，应当重视应用伦理学的研究，特别是要进一步推动经济伦理学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中国经济学和伦理学工作者近年来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体会。”^②根据陈筠泉先生的这种说法，他显然是从伦理学角度来探讨经济生活中的伦理问题的。这样一种经济伦理研究构成了应用伦理学的一部分。

我认为，这两种视角的经济伦理研究事实上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而且它们在国内外的学术界早已存在。国外经济学家的专门著作中有许多关于经济学中伦理问题的分析。同时，国外的学者也有从伦理学角度评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上面提到的《经济秩序理论和伦理学》的德方主编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1982年出版了一本《资本主义伦理学》的书^③就是属于这一类。本书作者（王锐生）今年（1999年）3月10~12日参加的在日本京都大学召开的《第七届经济伦理学哲学国际会议》，其论文题目亦大部分系从伦理学视角谈经济伦理问题，如“作为德行的信任”（大会主题报告）、“在社会与市场秩序中的信任与同情”、“商业中的伦理（与非伦理）的行为”、“韩国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儒学”、“交换与相互关系中的伦理学”、“从一种社会哲学观看进化、竞争与合作”、“亚洲经济危机中

的经济伦理问题”、“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伦理学”、“在德国浪漫主义中的信任与合作：亚当·穆勒在社会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偏重经济学内容的论文题目（如“股东价值原则与商号的目的”）则属少数。^④

在今天，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这两种视野的经济伦理研究都是需要的。就本书来说，我们主要是从伦理学角度去探讨经济伦理问题的。

三、经济伦理研究何以可能

经济伦理研究是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结合。它们属于不同的学科。纯粹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前者是“求知”的学问，所关心的只是从经济事实中引出规律。后者并非与知识毫无关系，但不是一门“求知”意味上的学问。它所主要关注的是对事物的“态度”，或者说，对事实的价值判断。如此说来，经济学与伦理学是如何能够结合在一门学科之中的呢？

要知道，人的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他同时在各个领域中进行活动，而这些不同领域的活动又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因此把社会视为纯粹的经济交换是不可想象的。在经济学领域，有所谓“实证经济学”——即纯粹经济学。这一学科企图超脱或排斥一切价值判断，只分析经济生活如何运行。换言之，它只回答“是什么”（即通过研究各种现象间的相互联系，并分析和预测经济运行的后果）；不回答好与坏（比如说，对于经济增长这一事实，实证经济学只说明增长的标准是什么，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什么，但拒绝说明这一经济增长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但是，实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因为一种理论研究总是为了实践指导的需要。人们从事经济学研究免不了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复杂的经济现象面前，“该做什么”。为了确定“该做什么”，就需要对经济事实做出有利还是有害的价值判断。

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价值判断中的价值，是指经济事物的社会价值（其中包括道德价值与非道德价值）。这样一种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的经济研究，就被称为“规范经济学”。1891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内维尔·凯恩斯第一次提出把经济学区分为“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经济伦理，无疑应当纳入“规范经济学”的范围。

规范经济学的存在表明，经济伦理研究是可能和必要的。因为尽管经济学是“求知”的学问，而伦理学主要是对事实的价值判断（对事物的态度）。但人的实践是一种以规律性知识为指导的有目的的活动，它本身恰好就是要把“求知”与“态度”，把实然与应然结合在一起。

回答经济伦理研究何以可能，还应当求之于人性根源。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首先有其种种肉体的需求。为了满足此种需求以维持肉体生存，就要有种种物质生活资料。而为了获得此种物质生活资料，人们必须结合在一起从事生产活动，由此又派生出物质产品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关系。这一切就构成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

因为人们只有结合起来，在结成的某种社会关系下才能进行生产，所以在这种社会结合的基础上就形成他的社会本性。就是说，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也是社会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那些属性（人的自然生物性即人的本能）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人的自然本能的满足总是要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来实现。实现人的本能的那种社会形式就属于人的社会本性范畴。这种社会形式的功能在于：一方面实现人的自然本能之需要；另一方面又从社会关系方面给予这种自然本能的实现以某种限制、约束。而各个时代人们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无非是这一类限制和约束，是无限丰富的人的社会本性的一种表征。

举例来说，当原始人受生存本能的驱使去狩猎时，受自然给予的天赋局限，他们只能以群的生产活动形式去获取生存资料。群的

生产劳动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进行，这样就在人的自然生物本性基础上形成人的社会本质（人的社会本性是其本质）。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来说，是他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归根到底又取决于人所拥有的生产力状况和一切现实生存条件。在原始人那里，最初的“经济伦理”就是这种人的社会本性的体现。既然人满足其食物需要（人的自然本能的体现）要通过集体狩猎活动。由此得到的猎物的分配方式自然只能是平均地共同享有。平均享用以“习惯”力量的形式被固定下来。这种习惯力量被原始社会史家称为“禁忌”（Tabu）。食物分配上的“禁忌”是指猎获物以及其他食物在原始集体内部共同消费时，依据每个成员的实际需要量分割成相应的若干份，成员们只准就地食用自己的一份，既不准带走，也不准侵占他人的份额；否则就违背了食物禁忌，将给整个集体带来秘不可测的严重危险，以致整个集体的覆亡，即使严惩违禁者也无济于事。此外，在食物丰富时，每个人的份额以吃饱为限，剩余部分仍作为集体财产由集体保存。在食品短缺时，每个人的份额大小则按其需要量成比例地减少。这时候，大家都只能吃个半饱。人类学家曾经在许多原始部落里观察到：原始人异常自觉地遵守这种平均享用任何食物的“道德”习惯（必须指出，“禁忌”与今天的道德规范略有区别。早期原始人还没有发展出文明社会那种道德规范。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所需要的约束人的行为的社会规范，是借助幻想思维形式建构起来的。“禁忌”的幻想性表现在：它以一种高悬于集体之上的秘不可测、不可论证的危险来警告人不得违反。这种危险就是幻想的产物。如果去掉这种神秘性、幻想性，许多禁忌事实上起着今天道德规范的作用。所以许多禁忌后来就逐渐转化为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了）。这种在后来私有制社会里的人们看来是道德高尚典范的现象，其实不过是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极端短缺、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以平均共享食物表现出来的原始社会的经济“伦理”是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上形成的人的社会本性的一种表征。再以性道德为例。原始人在狩猎

生产期间实行的性禁忌实际上就是他们经济活动中的一种性道德规范。而这种经济伦理的根源也是根源于人性的。在 100 万年前的时期,原始集体中两性关系形式还类似于现代的黑猩猩和大猩猩,即男性与女性之间实行杂乱性交。但他们要进行狩猎生产,此时狩猎是由成年男子和不处于怀孕、哺乳状态的少数成年女子共同进行的。在严酷的环境条件下,如果狩猎过程中时而发生两性关系,很容易涣散军心,贻误战机,造成失败,结果是大家饿肚子,甚至整个集体由于无法渡过难关而覆亡。因此,人们对狩猎活动中同时发生两性关系就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认为这时的性关系行为会给集体带来严重威胁。于是狩猎生产上的性禁忌规范产生了。其内容是:在准备狩猎和进行狩猎的全部活动中,绝对禁止一切性关系交往。这种禁忌后来又进一步扩展到整个生活时间,也就是说,集团内部永远排除性关系交往,只有在集团(氏族)之间才允许性关系交往。这些集团彼此结成婚姻联盟^⑤。如果我们把这种经济活动中的性禁忌理解为性道德规范的话,那么这种原始的经济伦理的人性根源就在于:人的自然生物本性(性本能需要)要通过特定社会形式来实现(满足)以便保证整体的生存、发展。而性禁忌这种社会规范所体现的就是以人的社会本性来约束可能有碍于整体生存、发展的人的本能的爆发。

总之,人的自然生物本性决定了人必须为其肉体生存而在社会结合中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种社会结合在赋予人的自然生物本性以社会存在形式的同时,还使经济活动打上了伦理道德的印记。就是说,伦理道德因素作为人的社会本性的表征,不可避免地渗进经济生产活动中去,规范着这种活动。这样,在人的自然生物本性与人的社会本性交互作用的基础上,就必然产生出各个时代的经济伦理问题。